

郑观应与盛宣怀关系研究

邵建

【摘要】 郑观应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但这并不是说他的社会交往没有主线，恰恰相反，他与重点人物进行重点交往的特征非常明显，盛宣怀就是他所经营的洋务派官僚网络中的核心人物。盛宣怀参与或主导了郑观应几乎所有的洋务派企业要职，对其家人的事业发展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郑观应为盛宣怀提供了良好的智力支持，作为得力助手，在洋务企业的兴办、经营与管理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究郑、盛二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从一个侧面了解郑观应的商业经历、盛宣怀的办企理念乃至中国近代洋务企业的发展，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郑观应 盛宣怀 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 (2014) 02-0121-09

郑观应和盛宣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同样负有盛名的人物，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出版、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代表性的著作有：夏东元的《郑观应传》、《盛宣怀传》，易惠莉的《郑观应评传》；重要的论文与学位论文更是不胜枚举。关于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在夏东元和易惠莉的著作中都有所提及，但是却并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的问题进行研究。一些其他的相关成果，如杨华山的论文《郑观应与汉阳铁厂》、苗青的学位论文《盛宣怀与近代上海社会》等，都涉及到了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却没有专门研究二人关系的论文。本文将郑、盛宣怀关系作为一个问题进行论述，主要是考虑到盛宣怀在郑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了最为核心的位置。二人关系作为郑观应所有社会关系网络中最具代表性的个案和最悉心经营的部分，不但可以通过关系的发展与维系了解郑观应经营社会关系网络的特点，同时也可以从中体会中国近代洋务企业发展的艰辛历程。有鉴于此，本研究以“郑观应与盛宣怀关系研究”为主题，详细梳理二人交往的过程、深厚情谊以及在洋务事业中的合作，无论是对于郑观应研究、盛宣怀研究，还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洋务运动史的研究来说，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

郑观应作为近代中国洋务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是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

想体系的理论家，在晚清商界、洋务派企业和思想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除了他的天赋、勤奋与机遇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拥有产生巨大能量的社会关系网络。郑观应是一个善于交际的绅商，无论是在同乡网络，还是在江浙士绅圈子，或是在晚清商界、政界、军界、学界，乃至道教界，都有私交甚好的朋友。

郑观应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亲缘网络，包括郑廷江、曾寄圃、唐廷枢、徐钰亭、徐润等颇有成就的洋行买办在内的家人、亲戚和朋友。郑到上海发展，这些人或多或少出了力。郑观应来沪之初，跟随叔父在新德洋行供职；之后由曾寄圃、徐钰亭、徐润介绍到宝顺洋行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地位；还有他后来与唐廷枢等人出资与外商一起办公正轮船公司，这些都是他先天具备的社会关系发生的效用。在上海站稳脚跟后，郑观应开始拓展新的社会关系网。这个新的网络比此前拥有的网络更为广阔，无论人的层次还是能够调动的资源也更为优质，其中代表性的人物有：麦奎因、卓子和、郭甘章、经元善、盛康、盛宣怀、李鸿章等人，特别是李鸿章和盛宣怀对郑观应进入洋务派企业提供了重要支持。除此之外，郑观应还与左宗棠、彭玉麟、邓华熙、王之春、张之洞等官场大员建立了联系，获得他们的欣赏与信任。正是有了这些可以发挥巨大能量的人脉，郑观应才会获得那么大的成就。1885年初，为摆脱被拘在港以及织布局、泰吉钱庄债务的困境，郑观应无奈通过谢家福“议请会五十分，每分银二百两，拟请沪友助三十分，粤友助二十分”，拟请资助的有在沪和在粤亲友50人，这些人都是所谓的“一宗阔佬”^①。通过这份好友名单，就不难看出当时郑观应的人际网络有多么广泛。

深入研究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大致能够总结出四个特点：

一是范围广。郑观应的社会交往复杂，人员接触非常宽泛。郑观应身份多变，既是实业家又是思想家，长期在洋行、洋务派企业担任重要职务，决定了他社会交往的广泛性。在郑观应的社会关系网中，就人员身份而言，有官员、商人、知识分子、道学人士、江湖术士；就人员政治界别来说，有满族贵族、军方势力派、地方大员、洋务派官僚、驻外使节、维新派、革命派、立宪派、外国政要；就地域而言，有广东同乡、江浙士绅、外国人、各地道友。

二是重点突出。郑观应的社会关系尽管非常复杂，但这并不是说他的社会交往没有主线，恰恰相反，他与重点人物进行重点交往的特征非常明显。在洋务派方面，郑观应社会关系网的核心人物是盛宣怀，与盛宣怀的关系是郑观应构建的与洋务派官僚社会关系网中的“圆心”；在官场方面，核心人物是王之春、邓华熙；在他痴迷的道学方面，郑观应尊为“圣师”的万启型占据了核心地位。

三是可用性强。郑观应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特别是他关系网中的核心人物，能够为他所用的特征非常明显，也是促成他事业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换句话说，就是对郑观应提供了最多帮助的人即是某一类型网络中的核心人物。盛宣怀主导了郑观应几乎所有的洋务派企业要职，王之春促成了郑观应两次为官经历，邓华熙数次向光绪举荐人才，万启型是郑观应晚年修道的精神支柱。

四是相互交叉嵌入与关联。郑观应与盛宣怀交好，与盛宣怀父亲盛康、弟弟宙怀（荔荪）的关系同样紧密，盛宣怀的其他同僚与友人很多也与郑观应私交甚笃。郑观应与王之春的关系也是如此，他通过王之春，得到左宗棠和彭玉麟的赏识，得到两位重臣差委，具体工作过程中又结识了一大批广东、福建等地官员。邓华熙与盛宣怀并不熟稔，郑观应曾去信盛宣怀为其世兄邓善麟请求粤汉铁路的差事^②，盛宣怀帮忙安排了邓善麟担任电报局粤局帮办^③。当郑观应对出任汉阳铁厂总办非常犹豫之时，盛宣怀写信给王之春，请他代为说服。郑观应与龚易图私交甚好，却

与易图之弟寿图关系欠佳。这些都说明郑观应社会关系网中的人，特别是官员之间，相互之间的交叉与关联度非常高，体现出一个由点及面的形态。

深入的研究表明，郑、盛二人的关系，在郑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至少能够体现出以上四个特点中的三个，即重点突出、可用性强和相互交叉嵌入与关联。

二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李鸿章的得力助手，官居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尚书、内阁成员等职，也兼任过招商局督办、铁路公司督办等职，曾先后办理上海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电报局、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等洋务企业以及开设南洋公学等教育事业，一生创造了中国诸多第一，被后人誉为“中国商父”，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奠基人与代表人物。除此之外，盛宣怀更为难得和为后人称道的是嗜好收集档案，自1850年至1936年间，盛宣怀及其家族保存大约17.5万件、1亿余字的通信、函电、公文、便条等档案史料，可谓吉光片羽，包罗万象，在人类档案史也称得上首屈一指。“盛宣怀档案”更是学界公认为研究我国近代史，尤其是研究洋务运动史、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实业思想史、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的第一手资料，这也许是盛宣怀为后人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

盛宣怀作为郑观应洋务事业中的主要领路人和老上级，自1880年代末两人相识以后，私交甚好，相互信任、互为支持数十年不变。据统计，郑观应自1892年复出以后，除了先后两次在招商局任职之外，还担任过的洋务企业大小职务大概有十多个，包括1896年兼任汉阳铁厂总办，1897年兼任铁路公司总董和电报局总董，1899年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1902年兼任上海官医局总董和吉林三姓矿务公司总董，1906年当选粤路公司总办，1910年随同办理汉冶萍厂矿、通商银行、电报、轮船、红十字会等。郑观应能够在如此众多的洋务派企业担任要职，都与盛对郑观应的信任和提携分不开。

关于郑、盛二人的关系，盛宣怀的评价是“共事最久、相知亦最深”^④。郑、盛二人相交相知凡四十年，郑观应还以“世侄”的身份，与盛宣怀之父盛康有密切交往。盛康曾官居浙江杭嘉湖兵备道按察使、皋台，为江浙官场名流，在晚清官场有一定的影响力，盛宣怀仕途进展顺利与之有相当的关系。郑观应与盛康、盛宣怀父子私交甚好，盛康作为前辈长者对郑观应也多有关照，郑观应常常在某些关键时刻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例如1882年前后曾经上书左宗棠、张树生等地方督抚建议架设扩展电线，为得到督抚们的支持，郑就在其中不断请求盛康居中疏通。

无论从哪个方面考察，郑观应经营的洋务派官僚网络的核心人物理所当然的是盛宣怀，尤其是在织布局亏耗案发生以后，盛宣怀无可替代地成为该网络的灵魂人物，二人的关系也成为郑观应构建的洋务派官僚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盛宣怀对各大洋务企业的运作，无论是轮船、电报，还是铁路、矿厂，郑观应都参与其中，或任职、或考察、或参考，发挥了一个离不开、靠得住的助手作用。没有盛宣怀的信任和支持，就没有郑观应在洋务企业中的高位。很多时候，郑观应是盛宣怀意图的贯彻者和操盘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人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紧密的合作者，利益也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二人作为亲密的伙伴，仅从存世的数量巨大的频繁通信记录就可以反映，尽管无法统计他们到底有多少书信往来，但仅据“盛档”不完全统计，二人之间所发之

(公)函、电、文就有大约 1700 余件，其中盛宣怀致郑观应 170 余件，郑观应致盛宣怀多达 1500 余件^⑤，足以说明二人往来及关系之密切。

实际上，从郑观应开始接触洋务派官僚开始，盛宣怀就成为他积极谋求私人关系发展的对象，二人相识并且熟知于江南赈务事务中，盛宣怀多年后回忆“吾侪数人以赈务始，相期并不仅以电务终，道义之交甘苦与共”^⑥，说的“数人”中就有郑观应。没有资料能够确切地证实郑观应在什么时间开始参与江南士绅所主导的赈务活动，至少在徐润自叙年谱记录同治七年(1868)罗列的历年参加赈灾活动的名单中还找不到郑观应的名字。^⑦1870 年代中后期，有了一定经济实力的郑观应成为其中的一员。此时，因为担任太古轮船总买办，郑观应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显著提升。1876 年，江南旱灾，在郑父文瑞的命令下，郑观应及其在外谋职的各兄弟开始涉足捐资赈济工作。次年，郑观应与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人人在上海创办筹赈公所(即上海协晋赈公所)，赈济山西灾荒，而后又支援河南、直隶等省。1878 年，郑观应又与徐润、盛宣怀等人创办义赈公所，除办晋赈外，兼办豫、直、陕等省灾荒。郑、盛二人在筹办赈务中结识，并很快发展为良好的私交，同时得到加强的私人关系还有其他一些在沪江浙士绅，具体表现在他与经元善、谢家福、沈善登、沈善经结拜为异姓兄弟，与盛宣怀之父盛康过从日密。^⑧

此后，二人又经历了津沪电报的艰苦创办。1880 年，郑观应受盛宣怀之邀，积极参与洋务活动，协助盛宣怀拟定《电报局招商章程》和《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开展津沪电线架设工作。盛宣怀负责北端的管理，郑观应则为南端一路的主要负责人，合作十分愉快。在与丹麦大北公司的谈判中，二人联手获得成功。津沪电报的筹备与办理，将郑观应与盛宣怀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具体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架设沪汉长江沿岸电线以及清政府与西方电报公司进行的谈判中，郑观应作为助手始终积极配合盛宣怀。赈务活动以及创办电报促成了郑、盛二人良好的私交，但毕竟这只是一个开始，赈务与电报工作自身的公益性和政治性还不足以让二人发展成至交好友，关系维系也多为公事，没有多少经济利益牵扯其中。真正让郑、盛结下一生牢不可破的深厚友情的时间，应是二人在矿业投资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合作之时。

1882 年夏，郑观应在屡次向江浙一带地方督抚上书申请延伸电报线之后，又多次向此前已有过湖北办矿失败经历的盛宣怀提出抓紧创办具有经济效益潜力的采矿业，并建议大举买进已办矿业的股票或集资建矿。盛宣怀也正有此意，他此前已在山东进行了有关勘矿的工作，二人在诸多矿业投资方向上步调一致，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尽管在接下来的经济风潮中，各种投资的股票价格大为缩水，但是郑、盛二人所达成的默契却得以形成。此后，郑观应筹办织布局亏耗后置其于不顾，将织布局的烂摊子甩手丢给盛宣怀收拾，自己远赴彭玉麟军中。对于此事，盛宣怀并未接手，将其交由经元善维持，却也没有因此对郑观应有所埋怨，反而证明了二人友谊之深。在郑观应因织布局、太古债务困扰回乡隐居期间，盛宣怀一直惦记这位老友，给予了相当的帮助。郑观应复出以后，逐步高升的盛宣怀更是不断委以重任。在李鸿章不再信任郑观应以后，郑观应所担任的洋务企业要职，绝大多数都是盛宣怀安排或斡旋的。随着盛宣怀地位的上升，特别是督办铁路建设权力的增加，二人又利用铁路带动地价上涨的良好预期，大量进行地产投机。

朋友之间很难不牵扯到经济利益，中间的关系处理好了能够进一步巩固业已存在的友谊，若处理不当、相互争利，那么一定会导致朋友关系由热转冷，甚至成为敌人，徐润与郑观应最后失好即是例证。好在郑、盛二人在经济利益问题上都处理得很恰当，这也是二人关系能够很好地维持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利益的关联一样，郑、盛二人在四十年的交往中，尽管在一些时候多少有

些“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的意识，但是这些对于老友之间的真正友谊毕竟只是等而下之的东西。辛亥以后，随着二人渐入老境，他们的情谊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这从他们之间的通信内容就能够体会得到，这段时间的通信，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已经是关心对方的身体健康。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真实流露，读之令人艳羨，不得不发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

例如，武昌起义爆发以后，盛宣怀作为清廷的替罪羊被迫流亡日本，他在给郑的回信中真情流露“弟因咳常咯血，每念生平徒遭横逆，天赋我质，将以还之。现于海滨买山种菜，不愿再闻故国兴亡事，惜太孤寂，无可与谈。阁下抱才未用，信道素深，倘能乘此闲暇命驾东游，海上神山虽属飘渺，但须磨舞子，不亚罗浮。数十年老友纵谈心性命之学，亦晚暮难得之境也。到此游资及归国川费当代筹措。……弟今年咯血，得西林宫保送我紫贝天葵煎服，灵验如神，顷已用完，闻此物产在罗浮，乞公设法代为购求若干寄下。觅购之资，必须奉缴。”^⑨

收悉该信后，按照盛的请求，郑立刻照办，“敬谕颐养安和，至以为慰。所需紫贝、天葵已嘱托粤友代购，候到寄呈。……兹附呈仙踪诗选一部，祈披阅，如欲闻性命之学，必须虔诚对天杯卜。许可候示前来一谈。”^⑩

同样身体状态不好的盛宣怀早在1909年（宣统元年）《罗浮倚鹤山人诗草》（乙酉本）作序时就已经表露出了想和郑观应一起修道的愿望“陶斋与予年相若，病肺亦相等，顾乃精悍悦泽，双瞳炯然，固知长生久视，自有要妙。宣怀牵于世网，齿发已衰，闻道已晚，安得角巾茵鞵，希踪于罗浮风雨间，翘首宵半，共听羽衣清唳乎！”^⑪

身在异国的盛宣怀倍感孤寂，最为思念的除了家人之外，就是郑观应，才会有希望他能够东渡日本相伴的要求。郑观应信中也有“书后就寝，梦公衣冠来会，相见甚欢。补此一笔，万勿出示外人”^⑫的内容，足见二人情感之深。

1915年初，盛宣怀已经病重在床，他还惦念着老友郑观应，因为郑观应欲辞招商局而担心老友晚年生活的经济保障，甚至郑及其子润林此后在招商局的工作也考虑妥当了，连手中的一些股票也想直接赠予郑。盛宣怀自己无法亲自写信，就让儿子代笔，言语情真意切“弟与阁下数十年旧友，拟为阁下筹款娱老。弟新买股票数百股，价值一百四十两，即为待鹤主人之股票，可更换新股票六百股。再有花红一二万。拟以阁下为公司副会长或为汉口总办，令朗（郎）调闽局便可敷衍，弟一可对我老友。”^⑬

次年春，郑观应、盛宣怀二人之间数十年的深厚情谊，因盛宣怀的病逝不得不终结。郑观应为盛宣怀所写的挽联，对其一生进行了高度赞扬和概括，也饱含了二人间的深厚情谊“忆昔同办义赈，创设电报、织布、缫丝、采矿公司，共事轮船、铁厂、铁路阅四十余年，自顾两袖清风，无惭知己；记公历任关道，升授宗丞、太理、侍郎、尚书官职，迭建善堂、医院、禅院于二三名郡，此是一生伟业，可对苍穹。”^⑭

三

郑、盛二人同为晚清著名的历史人物，对晚清维新思想的发展以及洋务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深厚情谊。这段情谊和关系的形成与维系本身，足以作为中国近代史领域颇有趣味的课题之一进行专题研究。如前文所述，1882年以后郑观应与盛宣怀在诸多矿业投资方向步调一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二人关系得以巩固和加强。在此后的

30多年中，郑、盛保持并不断发展了良好私交，最终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情。在数十年的事业起伏与人生沉浮的过程中，一些当初的知己、亲友由于各种原因，变得疏远甚或交恶，郑观应曾感叹“知己难得，老友落落如晨星”^⑮。那么，郑观应与盛宣怀始终能够维系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至少有三点最为重要：

一是及时良好的沟通。朋友之间，无论私交多深，都必须保持良好的联系与沟通。在日常联络方面，郑、盛二人来往频仍，逢年过节、遇事求人的礼尚往来都是人之常情，一来足以表示敬意，二来可以增加感情。二人往来信函中有很多涉及了赠送礼品、药品的赠送与代购、病情通报、约定见面等感情联系的内容，基本上能够反映出二人平时保持着频繁的联络，尽管琐碎，却是保持良好私交的必要条件。另外，在长时间的交往中难免有一些误会，处理得当可以及时消除，反之，如果不及时沟通，那么误会就会越积越深，最后无可收拾，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甚至反目。在这个方面，郑、盛二人处理的很好。例如，一段时间，盛宣怀以为郑观应要去邓华熙那里做官，对他有误解，郑观应及时去信沟通，化解误会。郑对盛宣怀“必欲弃而之他，就邓帅做官”、“何足共事，误我勋名”的指责，向盛直言说“来教……似不大察官应之本心，知我者当如是耶？官应实因《苏报》起见，绝无他意，惟可天表。我公不怜其抑郁孤愤以相援，而乃以激词相责，实感悚愧之至。”^⑯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二人对于发生的误会能够做到不掩饰、不回避，盛宣怀能够直接向对方提出疑问，并非如常人一般闷在心里，郑观应也能够及时去信解释，消除误会。正因为如此，小误会不至于发展成大误会，二人才能够始终相互支持与理解，从而并肩作战、情谊相投。

二是志同道合的愿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郑观应与盛宣怀志趣相投可能也是二人能够保持深厚情谊的重要原因。

在四十年的交往中，郑观应与盛宣怀在政治、洋务、改革等多个领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郑观应著《盛世危言》寄希望于晚清政府能够维新变法，主张向西方学习，呼吁社会经济变革，强调“商战”；盛宣怀不长于著书立说，但擅长兴办实业，是洋务派中最具代表性的实干家。二人在维持清朝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维新变法方面的观念是一致的，一个活跃在思想界，高举维新改革的大旗；一个是长期位居晚清政界高位的洋务派巨擘，以实业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互为支撑与呼应。

当然，受晚清整个政治气候和政治格局的影响，加之郑观应在长期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盛宣怀的诸多帮助和支持，其本人在很多事情的看法和做法上也受盛宣怀的影响颇深。特别是二人对待同一问题时的态度上，需要保持一致，在这个方面，可以说大多数情况下，郑观应都是被动地接受盛宣怀的意见，换句话说就是郑观应根本不愿意也无法违背盛宣怀的意愿。在铁路收归国有的过程中，作为粤商领军人物的郑观应，身处政府与投资商的夹板之中，却事事考虑到盛宣怀的立场与感受，想方设法与其达成一致。出于投资者的本性以及全体粤商的利益，郑观应又无法真正认同盛宣怀所推行的政策，此时他除了婉转地向督办川粤铁路大臣端方表示不同意见之外，只能采取回避的做法，干脆向盛宣怀提出了巡查招商局长江各分局的请求，并得到了盛宣怀的理解和应允。再如，在经元善因反对“乙亥建储”遭到慈禧通缉的事件中，无论郑、经二人是否存在什么样的矛盾，郑观应前后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足以让后人诟病，但确有政治压力之下的无奈。

三是倾尽全力的互助。当然这种互助由于郑、盛二人的社会地位不同、专长不同而表现有所

不同，郑观应在洋务思想与洋务企业经营方面具有优势和经验，盛宣怀位高权重，在官场和洋务派中具有广泛的人脉资源，基于此，郑观应为盛宣怀提供的多是智力支持和工作配合，盛宣怀为郑观应提供的多为个人及其家人发展的帮助与提携。

郑观应对盛宣怀的帮助在有关的政治斗争和洋务企业内部的斗争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比如，对于电报国有和铁路国有，郑观应全力支持盛宣怀，发挥了得力助手的作用。在与袁世凯派系展开的对轮、电二局的数度争夺战中，郑观应也站在盛宣怀一边。1908年，盛宣怀与袁世凯北洋集团在洋务企业领域的控制权之争，早已全面爆发，随着袁世凯的被迫隐退，盛宣怀重新夺回此前失去的控制权的机会虽已到来，但仍然困难重重。在这一关键时刻，盛宣怀倚重了远在南国的老友郑观应，意欲假借早已成为粤商领袖人物的郑观应的经验与影响力，通过股权控制的形式一举夺回轮船招商局。在这种背景下，郑观应于1909年初在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招股工作，5月作为粤港股东代表挟五千七百余股股票之势重返上海。郑观应此举，不但为盛宣怀在8月15日举行的招商局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当选董事会主席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使自己当选为董事会董事。此后郑观应又肩负了进京谋求招商局在邮传部商办注册的重任。该项任务起初由于邮传部的阻挠未获成功，但随着盛宣怀地位的不断提升和担任邮传部右侍郎的利好消息，商办注册在次年秋最终获得了成功，此举也标志着盛宣怀正式夺回了对轮船招商局的控制权。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被迫逃亡日本，郑观应出面组织维持会尽力维护轮船招商局的工作；盛宣怀自日本归国以后，郑观应又力助他重新控制招商局。因此，郑观应被盛宣怀盛赞为招商局的“第一救星”^{①7}和“创始伟人”^{①8}。除了轮船招商局之外，在盛宣怀控制的其他领域和企业，只要碰到困难或者急需开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派郑观应去解决，例如汉阳铁厂、铁路公司、粤汉铁路等，郑观应都被委任为企业总办。

另一方面，盛宣怀为郑观应的个人发展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前文所述，郑观应几乎所有的洋务企业重要任命皆出自盛宣怀之手外，郑观应的家人，特别是兄弟与儿子的个人发展也都与盛宣怀的帮助和提携息息相关。在郑观应的兄弟中，至少三弟思贤、四弟官桂、九弟庆余的工作与重要任职都是盛宣怀促成的。比如，为了思贤能够做官，郑观应曾多次致信盛宣怀，希望得到他的帮助。1900年夏，郑观应因身体原因致信盛宣怀，直接请求将招商局帮办一职“以三舍弟前湖北升用道候补知府名思贤、号曜东来此代理。……稟请札委舍弟思贤接办或授意三董事公举亦可。”^{①9}1910年底，郑观应专信盛宣怀为弟思贤谋职位“兹有原任贵州大定府知府郑守思贤系职道胞弟，去春服闋入京赴引，无如一缺之艰，至今尚未选到。致旅囊告罄，几吹吴市之箫，欲托钵而无门，觅棲枝而无地，涸鱼穷鸟，殊代生怜。……职道情□手足，不忍坐视，伏求赏派一差，不拘南方何事，但冀有托身之处，可以勉为敷衍，于愿已足。则恩施高厚，如鳌戴山，不独身受者衔感也。”^{②0}某年，郑观应专信盛宣怀为在老家的思贤谋求粤汉铁路的差事“三舍弟曜东，名思贤，系升用道湖北□□补用同知府，曾办武穴厘差。奉岑宫保奏调云南，因病乞假回里，历办各省赈捐，向为九江德兴洋行买办及承办官银号。前蒙准派汉口商局会办，嘱渠赴津稟见。嗣奉电谕，已另派人，无庸来前。至今尚在粤省。现在粤汉铁路开办需人。来函嘱求差使，谨送呈□□。乞准登记名簿内，查核试用，感同身受。”^{②1}

再如，1893年郑观应以招商局会办的身份巡查长江各口岸时“举贤不避亲”，非但对招商局九江分局提出改组建议，还多次向盛宣怀极力推荐四弟官桂担任九江分局领导职务，后来官桂如愿以偿担任了九江分局的总办，并藉此当上了第一任九江总商会会长。郑观应还曾经帮九弟庆余

在盛宣怀处购买优质股票，对此盛在复函郑观应时有所交代，“令弟定之兄一信已转交，接其复函云服银贰千元，顷于正月底交付，一俟付到即当照填股票四十股”。^②庆余在轮船招商局福州分局担任要职也是盛宣怀的作用。^③

至于郑观应的长子润林，更是得到了盛宣怀的特别关照，这在诸多郑观应写给盛宣怀的求助信中可以得到反映。如，润林因身体原因不适合久住北方，郑观应曾致函盛宣怀“小儿润林尚在山海关道署充当翻译兼海关交涉委员，月有薪水一百五十两，家眷住在道署，计蒙先后任梁、蔡、沈、周四公差遣已四年，均相得甚欢。惟近多咳嗽，据西医云不宜久居北地，待鹤于轮电两局未荐一人，今不得已叩乞赏给小儿北栈译员兼图司账或电报分局或招商分局总办差事，俾早日南旋，则感激无涯矣。”^④

润林养病沪上，郑观应多次向老友盛宣怀为其谋差，在盛宣怀帮润林进入招商局厦门分局之后，郑也屡次请求盛提拔润林，这在诸多信件中都可以看到。如“小儿润林席位如何？念念”^⑤、“小儿润林现理厦门招商局事……常川驻局……尚祈恩施格外，札委兼办厦门电报局。”^⑥对于郑观应为其子乃至其弟谋差、谋升职的请求，盛宣怀均表示设法成全，这些内容在他写给郑观应的信中也多有出现，比如“在轮、电二局代谋一席”^⑦、“遵事及令弟、令郎各节，容为留意”^⑧、“令朗（郎）调闽局便可敷衍，弟一可对我老友”^⑨等，由此润林如愿以偿得以出任轮船招商局厦门分局总办。

总之，盛宣怀作为郑观应构建的洋务派官僚网络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网中的关键人物，对郑观应在事业发展，特别是对其在洋务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郑观应作为盛宣怀的至交好友和得力助手，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兴办实业，都始终站在盛宣怀一边，充分发挥了参谋助手的作用，为盛宣怀政治与实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郑观应与盛宣怀的至交情谊虽然只是中国近代史人物研究中的个案，但却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二人数十年的共事经历，特别是在兴办洋务的宏大事业中的良好合作和互为呼应，虽然是基于良好私交和志同道合基础上的个人行为，但却合力为晚清维新思想和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① 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谢家福至李秋亭函》，转引自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② “现在粤汉铁路开办需人……邓筱帅之世兄候选同知名善麟，随宦多年，人极谨慎，精明浑厚，乡里共称。亦请附赐记名，同深感激”。[光绪二十三年?]月三十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上海：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索取号035516。

③ 参阅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索取号048787；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索取号048778。

④⑩⑬⑲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41、1242、923、923页。

⑤ 从统计的情况来看，二人之间的通信数量远不止这些，大量的信件有待进一步发现，或者已经缺失。

⑥ 《附录盛杏荪观察亲笔函》，虞和平编《经元善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52页。

⑦ 徐润曾回忆“历年同办公益善举之友：余莲村、谢绥之、施少钦、严佑之、陈竹坪、胡雪岩、盛杏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徐愚斋自叙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9页。

⑧ 郑观应对江浙士绅感情颇深，且高度认可，有诗为证“沪上善士多，江浙人犹劲。募捐合万金，好义群钦敬”。《郑观应集》（下），第1385~1386页。

⑨ 民国元年五月二十日《盛宣怀复郑观应函》，转引

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54页。

⑩ 民国元年五月二十六日《郑陶斋来信》，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56页。

⑫ 宣统元年十一月初一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695页。

⑭ 《郑观应年谱长编》，第803页。

⑮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索取号117191-3。

⑯ ?年三月十七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索取号016576。

⑰ 宣统二年九月二十日《盛宣怀复郑观应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19页。

⑱ 民国二年五月十一日《盛宣怀复郑观应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66页。

⑲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五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索取号074748；另见抄稿《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索取号049309。

⑳ 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索取号003586。

㉑ ?年?月三十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索取号035516。

㉒ 宣统元年正月初五日《盛宣怀复郑观应函》，盛宣

怀档案，索取号117575-2。

㉓ 甲寅闰五月二十七日《郑润林禀父函》，郑观应档案。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81页。

㉔ ?年七月四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盛宣怀档案，索取号074862-1。

㉕ 宣统二年八月十一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13页。

㉖ 宣统二年十二月七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35页。

㉗ 易惠莉《郑观应与他的家族》，王杰、邓开颂主编《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2003年，第325页。

㉘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盛宣怀致郑观应函》，转引自《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37页。

作者简介：邵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上海 200235

[责任编辑 陈子先]